

論語 孟子

研究

譚承耕著

B22215

研究

譚承耕

著

論

語

孟子

《论语》《孟子》研究

谭承耕 著

责任编辑：曹典漠 龚曼群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印张：7.25 字数：170000

1990年3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2次印刷

印数：1601—3,100

ISBN7—5355—1089—2/G·1120

定价：4.80 元

序

张岱年

一九二六年，我年未弱冠，读了梁任公先生在清华学堂的讲义《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很感兴趣。其首章是“《论语》、《孟子》”。我读了任公先生关于《论》、《孟》的评述，尤感亲切。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对于孔子的评论很多，既有批判者，亦有褒扬者，各抒己见，相互辩诘。无论如何，在中国学术史上，影响最大的思想家还是首推孔子，其次就是孟子。章太炎先生在《黄汉微言》中评论《论语》说：“《论语》所说，理关盛衰，赵普称半部治天下，非尽唐大无验之谈。又以庄证孔，而耳顺绝四之指，居然可明，知其所论卓绝，诚非功济生民而已。”我反复思考，认为太炎先生这个论断是正确的。

我们现在的历史任务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必须虚心学习，引进西方近代的文化成就，同时也必须考察、剖析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哲学。儒家学说，有维护等级制度的一面，也有强调独立人格的一面。孔子宣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肯定了平民的独立意志。又

宣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肯定了人的重要性以及人与人的同类关系。孟子更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的人格标准。孔孟以“仁”为最高的生活准则，实乃古代的人道主义思想，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理论价值。我们对于《论》、《孟》思想，应进行历史的辩证的分析。

谭承耕同志，钻研《论》、《孟》，已经多年，探赜发微，确有心得。最近撰写《论语、孟子研究》一书，对于《论语》、《孟子》的成书过程，对于孔子、孟子的深微思想，进行了科学的考察与深切的剖析，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近几年来，关于《论语》、《孟子》的专著与论文，亦可谓多矣，而此书确实能超越常谈，达到了新的水平。我看了谭承耕同志的新作，十分高兴，于是略述所感，以为之序。

一九八九年五月 序于北京大学。

● 引　　言

两部有世界影响的书

《论语》、《孟子》是有世界影响的书。而从评价的褒贬来看，却又是大起大落，一会儿被抬上天，一会儿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到底对这两本书应给予甚么样的评价呢？这就是本书企图回答的主要问题之一。

研究《论语》的书很多，日本学者林泰辅在《论语年谱》中所录的有关《论语》研究的著作，有三千种，这个统计数字可能还不完全。（见杨伯峻《论语译注·例言》）至于对《孟子》进行研究的著作，也是汗牛充栋。

孔子、孟子，过去被尊称为“至圣”、“亚圣”。历代封建统治者利用他们学说中的某些消极的因素，作为进行统治的理论根据，因而他们的著作——《论语》《孟子》也就日益被视为“神圣”的经典。《论语》在西汉时期，曾一度置博士，定为专门之学，由博士传授。魏末，何晏撰《论语集解》，至梁皇侃为之作疏；至唐，《隋书·经籍志》将《论语》列入经类。《孟子》在汉文帝时曾一度置博士，汉武帝时虽罢，但诸儒论事，却常引《孟子》以为证。以后，《孟子》的地位固然不能与《论语》并列，但经过某些学者如汉之赵岐、唐之韩愈、李翱，宋之二程的推重，它的地位便逐步提高。

五代蜀主孟昶石刻十一经，收入《孟子》，从此《孟子》就正式列入经部。南宋以后，《论语》、《孟子》二书的地位，则登峰造极了。南宋大理学家朱熹，将《论语》、《孟子》与《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合并为《四书》，作为学童必读的教材和士人科举考试的必修的科目。至此，《论语》、《孟子》，不但是儒家的重要经典，而且成为中国所有古籍中影响最大、最深、最广的书了。

《论语》在国外的影响，也非常深远。

朝鲜、日本，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国家。儒家典籍《五经》、《论语》、《千字文》等，很早就传入了。如公元285年，朝鲜的百济王派遣王仁渡海向日本王子献《论语》、《千字文》，不久，日本便出现了最早的学校——学问所，专门向王子、大臣们传授儒家经典。

在欧美，《论语》也传入较早。公元1687年，在巴黎便出版了用拉丁文翻译的《论语》（《大学》、《中庸》也被翻译出版）。

当今孔、孟和《论语》、《孟子》特别是孔子和《论语》，在国外更是风行一时。如日本长崎市于一八九三年修建的孔子庙的西廊大理石上所刻全部《论语》，现在还保存完整，供人观览。在新加坡，政府按照孔子的伦理思想，制定并实施了伦理教育计划，规定以《论语》作为中小学伦理教育的教材。国人经常举办文明礼貌活动，《论语》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以下引《论语》皆只注篇名）《孟子》中的“爱人者，人常爱之，敬人者，人常敬之”（《离娄下》，以下引《孟子》，只注篇名）成为这项活动的指导思想。在美国，近年来，孔子学说是学术界的热门课题。前不久，美国出版的《人民年鉴手册》将孔子列入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一九八二年为庆祝孔子诞辰二千五百三十三周年，美国各界人士于八月二十七日在旧金山行祭孔大礼，里根总统亦曾去函致意，给孔子非常高的评价。在这种气氛和背景下，美国对《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的研究，更为风靡一时。

自然，《论语》、《孟子》在我国历史上也曾遭受摧残和诋毁。在秦始皇统治时这两本书就与其他儒家经典（《周易》除外）一起遭焚

毁。“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随着“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的提出，作为孔、孟言行纪录的《论语》、《孟子》竟被片面地否定。在1974年掀起的所谓“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运动中，《论语》、《孟子》更被诋毁为万恶之源。

不过，由于《论语》、《孟子》蕴藏着不少有深刻意义的因素，所以不管某些人怎样对它们进行摧残和诋毁，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它们又在社会上受到重视。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它们传播的范围越来越广，影响越来越大。

《论语》、《孟子》蕴藏着的有深刻意义的因素，主要在于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论语》、《孟子》所表现的思想，特别是它所总结的一套政教伦理原则，比道、墨、名、法诸家，更能适应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因而在近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长期被采用为治国的主导思想，对中国历史，对中国传统文化、民族心态，都产生了无比巨大的影响。

第二、《论语》、《孟子》所记录的孔子、孟子的言论中，包含着一些普遍真理的因素；这些因素，在今天，甚至到将来，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都具有借鉴作用。

《论语》、《孟子》所包含的普遍真理的因素是丰富的。如《论语》、《孟子》都强调为政必须关心人民，提出“为政以德”（《为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尧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特别是《孟子》更将这种思想提高发挥到民本主义的高度（详下文）。这虽然是从希望封建政权长治久安的角度出发的，但这种对人民地位与作用的认识，却蕴含着朴素的唯物史观的真理因素，对以后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又如《论语》中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学命题，这在当时和以后漫长的封建社会，以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但这个命题蕴含着的人道主义因素，在今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却可资借鉴。

此外，《论语》、《孟子》在文学、教育等方面，还留下了许多名言。如“温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文质彬彬”、“尽善尽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等等，至今仍为人们所称引。

同时，《论语》、《孟子》本身语言精炼、形象，是古代散文的典范，这一点，也是它们长期流传、长期被人们所推崇的原因之一。

既然《论语》、《孟子》是有价值的书，那么就应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探索，以期“古为今用”。所谓用科学的方法探索，就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对这两部书的内容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研究与评价，分清它们的思想，有哪些在当时是进步的，而且是具有创新意义的？有哪些在当时是落后的甚至是反动的？与此同时，还要分清它们的内容有哪些在今天还可以直接应用？哪些东西经过“扬弃”还可供参考？哪些东西必须抛弃？这样做才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而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以为匡亚明先生的“三分法”，是提得很好的。匡先生指出：在研究古人著作时要分清他的“思想中，究竟哪些是必须批判‘决裂’的？哪些是应该批判继承即‘扬弃’的？哪些是可以直接为现代服务而加以继承和发扬的？”（《孔子研究》一九八七年第一期《孔子评传·外文版序》）匡先生的这些看法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本书将循此而展开论证。

目 录

引言：两部有世界影响的书

《论语》研究

第一章 源远流长

- 《论语》的命名、作者、体例与历代研究情况…… (1)
- 一、《论语》的命名与由来………………… (1)
- 二、《论语》的版本与体例………………… (2)
- 三、《论语》的历代注释及其版本………………… (6)

第二章 不平凡的时代，不平凡的身世

- 《论语》成书的社会背景及孔子生平………………… (9)
- 一、社会背景………………… (9)
- 二、孔子生平………………… (13)

第三章 时代新思潮的集中升华

- 《论语》思想体系的核心：仁………………… (21)
- 一、仁的基本含义………………… (21)
- 二、仁与礼的关系………………… (27)
- 三、对仁的历史作用的评价………………… (31)

第四章 实践理性与辩证法

- 《论语》的哲学思想………………… (40)
- 一、《论语》的天命观………………… (40)

二、《论语》的中庸思想 (45)

第五章 和平变革的政治构想

- 《论语》的政治思想 (50)
- 一、仁德政治 (50)
- 二、贤人政治 (55)
- 三、维护名分制度，争取和平变革 (56)
- 四、向往大同，倡原始民主之遗风 (60)
- 五、《论语》政治思想的社会属性 (62)
- 六、批驳一种错误论断 (63)

第六章 首创完整的道德伦理体系

- 《论语》的伦理思想 (68)
- 一、重视道德伦理的社会作用 (68)
- 二、重视统治者的道德修养 (69)
- 三、重视学习与实践在道德修养中的作用 (70)
- 四、重义轻利的道德评价 (71)
- 五、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 (73)
- 六、“君子”与“小人”概念的变化 (80)
- 七、完整的“三纲”伦理学说，非自《论语》始 (84)

第七章 “有教无类”，全面发展

- 《论语》的教育思想 (87)
- 一、“有教无类”与“诲人不倦”的可贵精神 (87)
- 二、值得借鉴的教育思想与教育方法 (91)

第八章 兴、观、群、怨，尽善、尽美

- 《论语》的美学文艺思想 (98)
- 一、对艺术的社会作用及其审美本质的认识 (98)
- 二、在美学艺术领域中贯彻中庸思想 (104)

第九章 早期的散文，典范的语录

- 《论语》的文学价值 (110)
- 一、《论语》中的人物 (110)

二、《论语》的语言艺术	(118)
-------------	-------

《孟子》研究

第一章 孟子其人,《孟子》其书

——《孟子》的作者、体例和历代研究情况	(125)
一、《孟子》的作者	(125)
二、孟子生平	(126)
三、《孟子》的体例	(128)
四、历代研究《孟子》情况	(128)

第二章 民本思想发展的高峰

——《孟子》的仁政思想	(132)
一、充分重视人民的力量与作用	(132)
二、关心人民疾苦,号召统治者与民同忧乐	(134)
三、企图解决土地问题,注意发展生产	(135)
四、坚持社会分工,重视商业活动	(138)
五、反对战争,但不反对正义的统一战争	(140)
六、矛盾与局限	(143)

第三章 对旧的局限的初步突破

——《孟子》的哲学思想	(146)
一、天命观	(146)
二、认识论	(151)
三、方法论	(152)

第四章 对道德起源和道德修养的深入探索

——《孟子》的伦理思想	(155)
一、重视道德伦理的社会作用	(155)
二、先义后利的义利观	(156)
三、性善的道德起源论	(164)

四、“尽心、知性、知天”的道德修养论……………(170)

第五章 卓越的美学见解

——《孟子》的美学及文艺思想……………(177)

一、关于善美关系理论的新发展……………(177)

二、关于美感普遍性、共同性和审美活动社会性的论述……………(180)

三、关于“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的论述……………(182)

第六章 形象的政论与哲理

——《孟子》的文学价值……………(185)

一、语录体的发展……………(185)

二、以孟子为中心的人物群象……………(187)

三、形象的议论……………(189)

四、独特的语言风格……………(198)

附录

关于孔子何以被尊崇的问题

——与匡亚明、蔡尚思等同志商榷……………(199)

跋……………(211)

后记……………(217)

● 第一章

源远流长

——《论语》的命名、作者、体例与历代研究情况

一、《论语》的命名与由来

《论语》是一部采用语录体记载孔子和孔子若干弟子的言论和行为的书。

据《汉书·艺文志》：“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这基本上说明了《论语》一书的由来。它说明其所以有这部书，是因为在孔子生前，孔子的弟子们，对孔子和弟子、时人的谈话以及弟子们从孔子那里听来而一起谈论的话，都各自有所记录。孔子死后，他的弟子们（包括再传弟子）就把这些记录加以整理，于是就成了这部书。

为什么取名“论语”？《汉书·艺文志》的解释尚不充分。如果看看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对“论”、“语”二字的解释，倒可看出当时取名“论语”的用意所在。他曾说：“论，凡言语循其理、得其宜谓之论。”“语，与人相答问辨难谓之语。”由此可见，这部书之所以取名《论语》，就是认为这部书所记录的孔子、孔子弟子与人相答

问、辨难的话语，都能循事物之理、得事物之宜，能恰当地解释和阐明事物的规律，故一开始就将此书取名为《论语》。

至于这部书的编纂者，从上述《汉书·艺文志》那段话可看出，《论语》的编纂者并非一人，而是一个集体，是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根据考证，大致可断定，编纂者不但是孔子弟子、再传弟子，还有再传弟子。最后的编纂者，可能是曾参的弟子和再传弟子。编纂的时间很长，始于春秋末期，基本结束于战国初期，个别部分可能延长至战国末期。

二、《论语》的版本与体例

《论语》传至汉，开始有三种不同的本子：

第一、鲁《论语》，有二十篇，就是现在的二十篇。

第二、齐《论语》，有二十二篇，比鲁《论语》多《知道》、《问王》两篇。

第三、古文《论语》，有二十一篇，无《知道》、《问王》两篇。篇目基本和鲁《论语》一样，只是把《尧曰》篇的“子张问”另分一篇，因而是二十一篇。

西汉末年安昌侯张禹，以鲁《论语》为根据，参考齐《论语》，将二者融合，是为《张侯论》。因张禹是汉成帝师傅，有权威，故传授甚广。

古文《论语》，是汉景帝时鲁恭王刘余在孔子旧宅壁中发现，当时并无传授。何晏《论语集解》说孔安国为之训解，这是不可靠的。

直到东汉末，郑玄又以《张侯论》为根据，参考齐《论语》、古文《论语》，作《论语注》。这个《论语》，就是我们现在所用的本子。

现在我们用的这个《论语》本子，分二十篇，每篇皆用首章两个字或三个字命名。积章成篇，章与章、篇与篇，并无内在联系。前后个别章有重复。计有《学而》、《为政》、《八佾》、《里仁》、《公

《冶长》、《雍也》、《述而》、《泰伯》、《子罕》、《乡党》、《先进》、《颜渊》、《子路》、《宪问》、《卫灵公》、《季氏》、《阳货》、《微子》、《子张》、《尧曰》，二十篇。自《学而》至《阳货》，除《乡党》篇外，这十六篇皆无明确的中心。只有这四篇是有较为明显的中心，即《乡党》篇第十是集中记载孔子的日常生活，从一个侧面反映孔子的为人；《微子》篇第十八，是集中记载孔子及古代圣贤在仕途中之进退出处；《子张》篇第十九，则集中记载孔子的几位著名弟子子张、子夏、子游、子贡等的言行；《尧曰》篇第二十，除最后三章记孔子的言论外，皆是集中摘录古史之名言，以见儒家治国之道。

《论语》的版本，也有个真伪问题。这个问题，是清代乾嘉年间，由赵翼、袁枚、崔述三人提出来的。尔后，对此问题有过探讨者，尚有康有为、梁启超、钱穆、钱玄同等。此问题尚未得出一致结论，有待学术界进一步探讨。

关于此问题，有许多人认为，今天的《论语》，已非原本，真的只占全书十分之八九。从《学而》到《乡党》篇，即《论语》前十篇，内容尚真实、纯粹，而后十篇则失真甚多。特别最后《季氏》、《阳货》、《微子》、《子张》和《尧曰》五篇则更驳杂不真。其根据是：(1)对孔子的称谓不合。前十篇记孔子答鲁定公、哀公问，皆称“孔子对曰”，而记答季康子、孟懿子、孟武伯等大夫之问，皆只称“子曰”，称谓之所以不同，正如朱熹所认为的，这是为了别君臣，辨上下。而后十篇记答一般大夫之间，亦用“孔子对曰”，这就不合当时礼俗。又如前十篇及后十篇中之前五篇，记孔子言，只称“子”，不称“孔子”；而后十篇自《季氏》以下五篇，则称“孔子”了。前十篇，记弟子对孔子面称“子”，只在对他人谈及孔子时，才称“夫子”；而后十篇中的《先进》篇“四子侍坐”章，《阳货》篇“武城”章，则面对孔子亦称“夫子”了。这是战国时语言习惯，与春秋时期不合。(2)语言风格不合。后十篇之后五篇语言风格迥异，甚多排句。如《季氏》篇之“三友”章、“三乐”章、“三愆”章、“三戒”章、“三畏”章、“九思”章，《阳货》篇之“六言六蔽”章、“子张

“问仁”章，《尧曰》篇之“子张问从政”章即是。这显系战国时语言风格，与孔子当时语言风格不合。（3）所记事实疑窦甚多。如《季氏》篇所记“将伐颛臾”事、《阳货》篇所记“公山弗扰以费畔”事，《春秋》经传无记载，其情节亦与经传不合。不是向壁虚构，则一定是道听途说之言。（4）《尧曰》篇，其体例完全与全书不合，它不记孔子及孔子弟子之言行，而专记古帝王之言与事，其“谨权量”句以下，也未标明为孔子之言。后“子张问从政”章全用排句。最后“知命”章，郑玄曾认为“鲁论无此章”。非常明显，是后儒据摭所闻，附益于此。

上述看法，我认为并不完全正确。《季氏》、《阳货》、《微子》、《子张》这四篇，应该说尚属可信。因为从事实看，并无充分根据能说它是不真实。如“季氏将伐颛臾”章，有人说它是虚构的，其主要根据有三：（1）冉有、季路，并未同时作季孙氏之家臣。（2）季氏伐颛臾之事，在《春秋》经传中无记载。（3）此篇篇幅很长，行文与他篇不类。但仔细想来，此所谓根据，不能成立。其一，所谓冉有季路同为季氏家臣，这是历代注释者的误会。其实，这篇短文何曾说到这个？只不过说二人同来访问孔子而已。而且从其对话中也显示出，当事者只有冉有，季路仅为陪伴罢了。其二，说季氏伐颛臾之事，在《春秋》经传中无记载，这正是因为有孔子劝阻，故未成为事实，所以就无记载。无记载并不能否定实有其事。其三，《论语》一书，杂出多手，编纂时间，长达百年，前后行文不一致，毫不奇怪，但这不能作为否定此项记载的根据。又如“公山弗扰以费畔”章，也有人认为所记不合事实、不可靠。因为公山弗扰以费畔的事，是在鲁定公十二年。当时孔子身为鲁司寇，主持“堕三都”，而公山弗扰不肯毁，遂据费以畔，在这时，孔子不可能有投靠公山不狃的想法。但只要仔细考证，就会发现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公山弗扰以费畔，实际早在鲁定公八年即已发生。当时阳虎入欢阳关叛季氏，而公山弗扰已为费宰，正不满于季氏，虽未公开背叛季氏，但遥为阳虎声援，暗中勾结，